

# 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下的国有经济 “五力”评价研究\*

——基于共同演化理论的分析



王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实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从历史场域视角对国有经济“五力”目标形成的演进脉络进行系统回溯,深入分析了“单力—两力—三力—四力—五力”的阶段演化。基于共同演化理论以及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对国有经济“五力”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国有经济“五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特征维度高度契合,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赋予国有经济“五力”更深刻的内涵,可以通过世界一流企业演化规律深度透视国有经济“五力”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模型,形成包含17个一级指标、44个二级指标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国有经济“五力”进行系统评价发现: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分项指数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指数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但是省际间和行业间差距仍然较大。最后,围绕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协同性、夯实制度基础与能力基础、实施差异化提升策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国有经济 国有企业 世界一流企业 五力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4)03—0086—22

##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国有经济“五力”目标,即“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此进行了再次强调。增强国有经济“五力”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发展国有经济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欧阳耀福和李鹏,2021)<sup>[1]</sup>,而且是新发展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途径和战略任务(李正图和米晋宏,2022)<sup>[2]</sup>。实践中,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必然要求以对国有经济“五力”的衡量和评价为基础。一方面,衡量与评价的内容为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实践提供了导向;另一方面,衡量与评价的结果为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战略部署和实施举措提供了基点。只有对国有经济“五力”进行科学衡量和有效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开展针对性的提升实践,才可能真正达成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目标。

收稿日期:2023-03-10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与提升研究”(20AGL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选择研究”(20&ZD073);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王欣,女,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国企改革、公司治理与企业国际化,电子邮箱:wangxin\_1031@163.com。

虽然国有经济“五力”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规范性学术概念,但学术界围绕国有经济“五力”或其相关议题已经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呈现为两条径路:第一条径路是整体型研究,即将国有经济“五力”作为一个完整概念进行研究,目前这一类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国有经济“五力”的目标演进与理论内涵(王欣,2020<sup>[3]</sup>;张园等,2021<sup>[4]</sup>)、评价体系构建和实证测度(欧阳耀福和李鹏,2021<sup>[1]</sup>;张园等,2021<sup>[4]</sup>),以及进一步提升国有经济“五力”的方向和路径(王欣,2020<sup>[3]</sup>;李政,2022<sup>[5]</sup>)。第二条径路是独立型研究,即对国有经济“五力”中的某“一力”单独进行研究。国有经济控制力最早得到关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涵盖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内涵理解(张继良,1999<sup>[6]</sup>;宋冬林和于群,2003<sup>[7]</sup>;周新城和王世崇,2012<sup>[8]</sup>)、层次与表现(陈炳芳和卢华,1998<sup>[9]</sup>;张国,2012<sup>[10]</sup>)、测算与评估(周学文,1999<sup>[11]</sup>;谢敏,2010<sup>[12]</sup>;李钢和何然,2014<sup>[13]</sup>)、数量界限(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1<sup>[14]</sup>;盛毅,2010<sup>[15]</sup>)、实现条件与路径(徐传谥和齐树天,2002<sup>[16]</sup>;欧阳强,2005<sup>[17]</sup>;王子林,2017<sup>[18]</sup>)。国有经济创新力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涉及国有经济创新力的理论内涵、核心地位、主要机制、测算评价、路径选择(欧阳耀福和李鹏,2021<sup>[1]</sup>;李政和周希祺,2022<sup>[19]</sup>;滕越等,2022<sup>[20]</sup>)。此外,也有少量研究关注到国有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与实现(周立群,1998<sup>[21]</sup>;丁志铭和丁晓钦,2004<sup>[22]</sup>)、国有经济影响力的评价(刘震伟和张正博,2008)<sup>[23]</sup>。

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关于国有经济“五力”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整体型研究较少,且深度不够。国有经济“五力”具有整体性,对其中“一力”的研究应当置于“五力”的整体情境中予以考察,否则对其中单独“一力”的研究可能偏离国有经济“五力”的本原涵义。目前,只有少量学者针对国有经济“五力”开展了整体型研究,对国有经济“五力”的理论认知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二是对国有经济“五力”的评价缺乏统一的顶层导向,逻辑一致性与严密性不足。欧阳耀福和李鹏(2021)<sup>[1]</sup>、张园等(2021)<sup>[4]</sup>从整体上对国有经济“五力”构建了评价体系并开展了量化评估,但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仍然是针对每“一力”独立地构建评价体系,每“一力”在评价指标设计上缺乏清晰的、统一的顶层导向,未能形成“理论认知—评价导向—评价指标—量化评价”的逻辑一致性,评价指标选择和设计的逻辑严密性有待增强。三是对国有经济“五力”的评价层次与测度指标尚存分歧,引致评价结论出现较大差异。国有经济“五力”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评价,不同层次的评价重点和测度指标不尽相同。尤其是,目前对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衡量远未达成共识,评价结论分歧较大。

进一步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制度情境性,国有经济“五力”的评价和研究应当嵌入中国新时代新征程的宏阔视野,将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国有经济“五力”评价和研究的基本情境,即国有经济“五力”的评价和研究需要以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要依托企业高质量发展(黄速建等,2018)<sup>[24]</sup>,因此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则是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取向。实际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意味着,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和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应着眼于打造“世界一流”。基于此,本文以共同演化理论为基础,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出发,以世界一流企业标准为导向,对国有经济“五力”评价进行系统性探索,尝试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实现对国有经济“五力”评价研究的丰富和拓展。

相较已有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共同演化理论对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进行深度探寻,建立了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与国有经济“五力”的链接关系,以此对国有经济“五力”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与深度挖掘;二是构建了面向世界一流

济“五力”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将评价指标收敛于国有经济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并区分出系统评价与对标引导的不同指标功能;三是基于上市公司群体开展了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基于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演化特征与比较分析,提出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对策建议。

## 二、国有经济“五力”目标形成的历史场域与演进脉络

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目标和要求赋予了国有企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和任务(胡叶琳和黄速建,2022)<sup>[25]</sup>。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缘于历史的淬炼、理性的凝结和经验的升华,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形成的(王欣,2020)<sup>[3]</sup>,只有置于历史场域、透视历史背景、审视历史过程,才可能清晰把握国有经济“五力”目标形成的历史逻辑。梳理4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单力—两力—三力—四力—五力”的历史演进脉络。

### 1. 作为起点的“单力”目标时期(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完全按照行政逻辑和计划指令运行,严重缺乏活力和效率,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释放和增强企业活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6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印发,提出要在“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指出了“严重影响企业活力”的三个方面因素,提出通过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予以改变。在这一时期,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国家先后实施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实施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展以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一系列“放权让利”改革,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发展活力。

当时提出的“企业活力”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八千多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就是说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这一时期以增强企业活力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逐步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属性,企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提升也为后续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当时“企业活力”目标的提出和落实,是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源泉,可以认为是国有经济“五力”形成的起点。

### 2. 作为萌芽的“两力”目标时期(1992—1998年)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时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国有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开始得到更多关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既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关注到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1997

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由此,正式提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在这一时期,国家一方面是从“单个搞活”的角度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从“整体搞活”的角度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黄群慧,2018)<sup>[26]</sup>。

从企业活力到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的正式提出,表明党和国家对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国有经济竞争力的要求逐步清晰。从国有经济控制力来看,在党的十五大之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更多地强调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支柱,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侧重于量的考察。而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有经济控制力则更强调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即“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突出对质的要求。从国有经济竞争力来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表明国有经济竞争力就是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的能力。党的十五大同时提出国有经济控制力与竞争力,更加强调国有资产的质量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水平。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提出的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已经蕴含了国有经济“五力”的部分内容。

### 3. 作为雏形的“三力”目标时期(1999—2011年)

世纪之交,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进入攻坚阶段,加之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国有经济对增强综合国力的作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关注。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即最早的国有经济“三力”目标。2006年12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在此之前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涉及到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即新的国有经济“三力”目标。在这一时期,着眼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国家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同时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

从最早的国有经济“三力”目标来看,除了控制力要求“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外,影响力和带动力强调国有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和带动作用。实际上,带动力所指的国有经济带动作用,可以归入更宽泛意义的影响力范畴,这意味着新的国有经济“三力”目标中的影响力已经囊括了带动力的内容。在新的国有经济“三力”目标中,国有经济活力在内涵上对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企业活力进行了拓展,既包括国有企业的机制活力和经营活力,也涵盖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活力。此外,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作为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内容,这也为后来创新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出埋下了伏笔。基于此,这一时期提出的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已经显现出国有经济“五力”的雏形。

### 4. 作为发展的“四力”目标时期(2012—2018年)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的下调使得多种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国有企业潜存风险增加,国有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得到更多重视。2015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

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意味着,国有经济发展目标在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三力”基础上,正式将抗风险能力囊括进去,演化形成国有经济“四力”目标。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申了国有经济“四力”目标。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这一时期,国家一方面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以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分类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项举措,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国有经济“四力”目标既延续了国有经济“三力”目标对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认知,又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可持续性的角度增加“抗风险能力”维度,同时还进一步突出国有经济活力的核心地位。抗风险能力不仅是国有经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而且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的重要内容,反映出着眼长远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健康稳健发展的要求。同时,国有企业活力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增强活力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由此可见,国有经济“四力”目标不仅是对国有经济“三力”目标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

#### 5. 作为成型的“五力”目标时期(2019年至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全球竞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被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国有经济“五力”目标,即“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明确将国有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纳入“五力”范畴。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次强调“五力”目标。其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将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纳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目标要求。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2023年开启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明确“以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国有经济“五力”既是构成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也是发挥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重要支撑。在这一时期,着眼于全面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国家采取了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实施现代产业链长制等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相较于“四力”目标,国有经济“五力”不仅将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延续下来,而且以竞争力和创新力取代活力,更能凸显国有经济发展目标的时代性、规律性与趋势性。从时代性来看,竞争力更加契合当前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超竞争态势,构建国家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成为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创新力更加匹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涌现,更加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创新驱动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从规律性来看,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成长不仅依赖自身的内在动力,而且反映外部的竞争和比较。活力虽然与竞争力、创新力有关联,但其更强调自身视角,也更宽泛,而创新力可以说是活力的根本源泉,竞争力则是活力的外在集中表现,因此竞争力和创新力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成长规律。从趋势性来看,持续提升竞争力和创新力是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五力”目标实现了对国有经济“四力”目标的超越,更趋成熟和定型(李政,2022<sup>[5]</sup>;李政和周希禛,2022<sup>[19]</sup>)。

综上,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形成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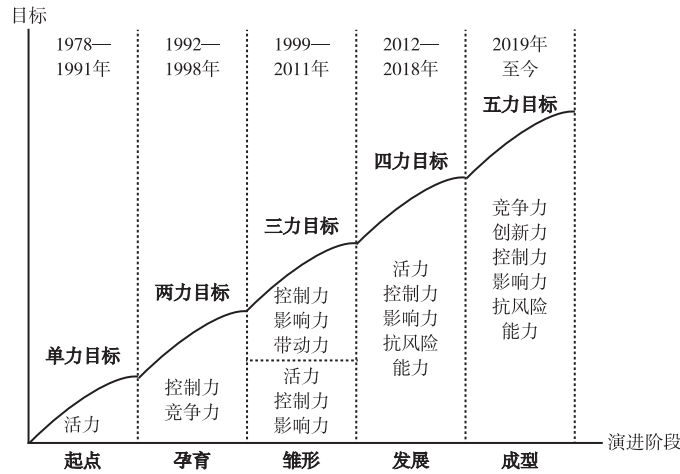


图1 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演进脉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三、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下国有经济的“五力”内涵

对国有经济“五力”的深刻认识不仅需要从纵向演化视角考察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更要从横向比较视域把握其匹配于世界经济与企业发展规律的理论内涵,前者反映出国有经济“五力”的制度嵌入性,后者则表明国有经济“五力”的规律符合性。只有置身于全球竞争的现实情境和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才可能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国有经济“五力”的丰富内涵,才可能透过现象准确认识国有经济“五力”的内在本质。

#### 1. 世界一流企业标准为深化国有经济“五力”认识提供新视角

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在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高效能、竞争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谁就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甚至占据主导权(刘瑞明和亢延锟,2018)<sup>[27]</sup>。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全球领先的发展理念、运营方式、管理模式和世界第一流的产业布局、创新能力、价值创造水平,引领着全球经济、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方向与潮流,是全球企业群体中最优秀的代表,处于企业金字塔的塔尖位置。世界一流企业一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地位、话语权、制定或改变游戏规则能力的集中反映(崔新健和欧阳慧敏,2020)<sup>[28]</sup>,同时还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参与主体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者。在企业层面,世界一流企业代表了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时代方向,是其他企业学习的标杆;在产业层面,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往往是产业链链长、产业生态构建者,代表了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在宏观经济层面,世界一流企业通常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象征,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重要指针;在社会层面,世界一流企业高度嵌入于社会,是众多社会主体的联结者,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社会转型和社会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这些表明,世界一流企业可以跨越微观、中观、宏观反映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成为观察企业、产业、经济、社会的重要窗口。

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必然要求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刘瑞明和亢延锟,2018)<sup>[27]</sup>,以世界一流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支撑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推动国有企业加快迈向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内在需要,而且是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经过40年多年的改

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肖红军,2020)<sup>[29]</sup>,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方面展现出相对其他企业的优势(曾宪奎,2020)<sup>[30]</sup>,一批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接近于世界一流企业(黄群慧等,2017)<sup>[31]</sup>;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在关键维度上尚未达到世界一流(崔新健和欧阳慧敏,2020)<sup>[28]</sup>,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仍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任务(王欣,2023)<sup>[32]</sup>。鉴于此,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应当契合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基于世界一流企业标准能够对国有经济“五力”进行更加深刻、系统和一致的理解。

进一步来看,世界一流企业是“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标杆企业”(崔新健和欧阳慧敏,2020)<sup>[28]</sup>,并且能够“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和“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黄群慧等,2017)<sup>[31]</sup>。目前对于什么样的企业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回答尚没有形成共识,对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存在不同的刻画,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显性的结果维度,即世界一流企业绩效表现。世界一流企业在规模、效益、效率等绩效指标上通常表现出色,尤其是在效益、效率上处于所在行业或领域的领先地位,可以概括为“业绩优异”。二是中间的行为维度,即世界一流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世界一流企业在创新、战略、产品、治理、管理、品牌、国际化等方面具有引领趋势的能力,是其他企业学习的标杆。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因此世界一流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可以概括为“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三是隐性的价值维度,即世界一流企业秉承的经营理念 and 价值观。世界一流企业往往是使命驱动型企业,基于社会价值本位定位企业宗旨和经营理念,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积极价值,形成被社会广泛尊重的无形影响力,可以概括为“广受认可”。无论是“业绩优异”,还是“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抑或是“广受认可”,都是全球范围的,而不只是某个国家或区域内的。由于世界一流企业的“一流”是集成性的,表现为强大的整体竞争优势(黄群慧等,2017)<sup>[31]</sup>,因此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应当全面涵盖显性的结果维度、中间的行为维度和隐性的价值维度。从三个维度的刻画来看,世界一流企业的诸多特征集成收敛于高质量发展,即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全球领先的高质量发展能力、行为表现和绩效结果,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企业。

国有经济“五力”与世界一流企业标准高度契合,涵盖了显性的结果维度、中间的行为维度和隐性的价值维度,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业绩优异”“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广受认可”特征形成映射。国有经济竞争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业绩优异、产品卓越相对应,即竞争力体现于全球范围的业绩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国有经济创新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创新领先相对应,即创新力体现于创新能力与水平;国有经济控制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产品卓越、创新领先相对应,即控制力体现于全球产业与产品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全球行业技术中的趋势引领能力;国有经济影响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品牌卓著、广受认可相对应,即影响力体现于全球范围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业绩优异、治理现代、广受认可相对应,即抗风险能力体现于风险管控能力、经营业绩风险与社会风险的水平。国有经济“五力”与世界一流企业标准的映射关系,一方面表明国有经济“五力”符合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方向要求,全面覆盖了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三个领军”(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三个领先”(效率领先、效益领先、品质领先)、“三个典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典范、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有经济“五力”契合于世界一流企业的集成特征即高质量发展,能够较好地反映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五力”对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指引具有合意性。

## 2. 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赋予国有经济“五力”更深刻的内涵

企业成长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Penrose, 1959)<sup>[33]</sup>,世界一流企业是企业持续成长到高级阶段后的一种表现形态。由于共同演化视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企业分析框架,可以用来探索动态视角和复杂环境下企业的演化过程与结果(Lewin和Volberda, 1999<sup>[34]</sup>; Volberda和Lewin, 2003<sup>[35]</sup>),因此,基于共同演化视角对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逻辑进行解构具有合理性与有效性。共同演化是互动者之间的演化轨迹相互影响,进而改变彼此的适应图景(Hodgson, 2002)<sup>[36]</sup>和平均适应(黄凯南, 2008)<sup>[37]</sup>。按照共同演化观点,企业成长演化到世界一流状态,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企业内两个层面共同演化的结果,前者即宏观共同演化,后者则是微观共同演化(Lewin等, 1999)<sup>[38]</sup>,呈现出多层嵌套性特点。

从宏观共同演化来看,世界一流企业的崛起和保持领先状态,是企业成功实现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共同演化,其中除了一般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制度环境和国情特征。这意味着中国培育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制度情境和基本国情。由此,对国有经济“五力”的认识也应当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情境中。从微观共同演化来看,世界一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成长得益于企业内部的资源、知识、能力、结构、文化、权威等元素的成功共同演化。从某个时点甚至某个时间区间的横截面来看,资源基础观(Wernerfelt, 1984<sup>[39]</sup>; Barney, 2001<sup>[40]</sup>)表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卓越表现在于其能够更加高效地获取、聚合和维持有价值、稀缺、难替代、不可模仿(VRIN)的资源,这些资源使得世界一流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优于竞争对手的经济社会价值。从长周期来看,动态能力理论(Teece等, 1997)<sup>[41]</sup>表明,世界一流企业能够经受住外部“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冲击,在高度动态复杂多变环境中保持韧性成长,成功穿越经济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关键在于其拥有创造、扩张和调整其资源基础的动态能力(Helfat等, 2007)<sup>[42]</sup>,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感知和抓住突现的机会,并快速重构必要的资源(Teece, 2007)<sup>[43]</sup>。无论是静态视角下基于资源的成长逻辑,还是动态视角下基于能力的成长逻辑,世界一流企业都在更深层次强调成长质量,资源基础的“独特性”和动态能力的“动态性”将催生世界一流企业更高的成长质量,形成“资源基础—成长质量—动态能力—资源基础更新—成长质量升级”的螺旋上升式成长路径。这意味着,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视角对国有经济“五力”进行审视,需要将“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要求嵌入。由此,国有经济“五力”不仅有程度上的含义,更应该突出其质量水平方面的含义。特别是,微观共同演化表明,世界一流企业“独特性”内部元素的形成、改变与作用发挥是在互动中实现的。国有企业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不仅需要静态关注企业成长的各个元素状态与功能,更要动态挖掘各元素之间的共同演化与功能协同。国有经济“五力”亦是如此,不仅“五力”中的每一“力”都是国有企业的资源、知识、能力、结构、文化、权威等元素共同演化的结果,而且“五力”之间也存在微观共同演化机制。

更进一步,对微观共同演化各元素“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的强调,赋予国有经济“五力”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要求。对于国有经济竞争力,一般意义的竞争力通常是指通过高效地吸引、配置和利用资本、劳动力等关键要素,提高经济活动的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在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盈利和可持续发展。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视角来看,在一般意义的竞争力基础上,“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分别更强调国有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全球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对于国有经济创新力,一般意义的创新力是指创新主体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能力,即通过有效实施创新投入、开展创新活动,最终实现创新产出的能力。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视角来看,“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对创新力提出更高要求,分别强调国有经济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能力、创新效率与效力、创新体系化能力。对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其通常指的是通过掌握和利用资产、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要素,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及社会公共部门发挥主导作用。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视角来看,控制力除了国有经济语境和中国情境之外,更加强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控制能力,“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分别要求更加重视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控制力、关键能力控制力、趋势把控力,尤其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的三大作用。对于国有经济影响力,经济学中的影响力通常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积极的影响体现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对社会福祉的贡献和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视角来看,影响力更加强调整影响的可持续性和互动性,“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分别要求更突出国有经济的共享价值创造力、品牌影响力、社会认可度。对于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其通常指的是抵御内外部风险带来的损失不确定性、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从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视角来看,“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分别更强调国有经济抵御风险的冗余资源、体系化风险管理能力、企业本体健康性。

从演化规律来看,世界一流企业与内外环境的共同演化呈现出多层嵌套性、双向或多向因果、正反馈机制、非线性路径的特征(Lewin和Volberda,1999<sup>[34]</sup>;Porter,2006<sup>[44]</sup>),这为解构国有经济“五力”提供了启示,尤其是有助于对“五力”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度透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多层嵌套性特点意味着宏观共同演化和微观共同演化最终共同催生世界一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即不同层面的共同演化虽然有不同定位和机制,但它们统一和集成世界一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国有经济“五力”,“五力”不是相互割裂、彼此孤立的,而是密切配合、相互依存系统和整体,共同反映新时代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目标状态和发展范式,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国有经济需要由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由规模偏好转向高质量发展、由要素驱动发展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而国有经济“五力”从五个不同维度准确刻画了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状态。国有经济“五力”中的每一“力”对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不同作用,因此在“五力”系统中的定位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都与其他“四力”协同进化。对于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说,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是基础、创新力是根本、控制力是前提、影响力是目的、抗风险能力是保障。二是双向或多向因果、正反馈机制、非线性路径特点表明,世界一流企业是一个动态系统,能够通过“变异、选择、保留”机制实现在“世界一流”领先状态上的高阶动态均衡。对于国有经济“五力”而言,“五力”形成一个动态系统,“五力”之间演化的双向或多向因果、正反馈机制和非线性路径,使得“五力”之间呈现相互增强与平衡关系,进而使国有经济动态均衡地演化和处于高质量发展状态。

#### 四、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构建

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是一个学术难题和实践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评价体系与标准的不同将导致评价结果的巨大差异。然而,无论何种评价体系与标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需要符合发展阶段和时代情境。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依据必然是国有经济“五力”目标,评价标准是世界一流企业标准,这意味着需要面向世界一流构建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从而为对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价奠定基础。

##### 1. 构建思路

国有经济“五力”的理论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表明其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构建不仅需要基于深度的理论逻辑演绎,更要立足于实践导向的经验习得和规律把握,将应然性与实然性结合起来,增强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 兼顾两个层面的评价功能,即整体的系统评价与个体的对标引导。理论上讲,国有经济“五力”评价的对象“国有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是将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评价考察,因此国有经济“五力”评价首先应是对国有经济的整体表现开展的系统评价,这意味着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必须从宏观上反映国有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然而,一方面,国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评价的基础数据往往较为缺乏,通常需要由多个国有企业个体的数据进行“群体集成”,即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的多数指标将溯源自国有企业个体;另一方面,代表性国有企业个体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也是观察国有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窗口,且国有经济“五力”对于国有企业个体依然成立,国有企业个体的“五力”表现能够反映出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背景,对国有企业个体的“五力”评价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对标找差,引导其“补短”进阶迈向世界一流企业。这意味着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除了系统评价功能之外,还应当可以用于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对标引导,需要将世界一流企业的“业绩优异”“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广受认可”要求反映在“五力”评价体系中。

(2) 区分三大构面的评价重点,即功能性评价、结构性评价和运营性评价。国有经济“五力”评价需要关注于三个构面的评价:一是立足于国有经济使命定位的功能性评价,即对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功能达成程度进行评价,反映国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独特价值;二是立足于经济生态系统的结构性评价,即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大系统、重点产业中的结构性嵌入情况进行评价,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关要求导入的评价;三是传统上普遍认知和强调的运营性评价,即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自身发展水平的评价,显性化地展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运行状况,“五力”内涵很大程度上契合于运营性评价。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宏观共同演化机制表明,制度环境和国情特征是国有企业迈向世界一流的重要变量,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嵌入国有经济“五力”的结构性评价中尤为必要。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当全面满足运行性评价、功能性评价和结构性评价的需要,能够用以衡量国有经济发展的多层次价值;另一方面也应当区分国有经济“五力”中每一“力”评价体系在运行性评价、功能性评价和结构性评价上关注重点的差异,“五力”均不同程度涉及运营性评价,但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对运营性评价聚焦更多,而功能性评价和结构性评价主要通过控制力和影响力予以体现。

(3) 基于三重导向的评价指标,即通用指标、趋势指标和特色指标。面向世界一流构建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需要依据理论逻辑导向、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和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分别识别、选择和确定评价指标。从理论逻辑导向来看,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各自均有其理论蕴含,通过理论蕴含可以正向推演每一“力”的结构维度和一般化的衡量指标,这意味着每一“力”评价指标的设计首先需要基于理论推演形成通用指标。从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来看,世界一流企业的领先状态代表着一种趋势,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构建应当能够反映这些趋势,将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和成长逻辑嵌入到评价体系构建,每一“力”评价指标的设计都需要审视和借鉴世界一流企业在该“力”上的关注点,形成具有前瞻意义的趋势指标。尤其是,要将世界一流企业成长对“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的要求嵌入到每一“力”的评价指标设计,突出国有企业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导向。从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来看,“五力”评价的对象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虽然对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具有特殊性存有争论,但它们在事实上所展现出来的特殊性质却是毋庸置疑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应当能够反映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特殊要求,每一“力”评价指标的设计需要考察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该“力”上是否具有特殊关注点,形成体现这些特殊性的特色指标。

(4)符合三个方面的评价要求,即整体性、协调性和代表性。世界一流企业与内外环境共同演化的多层嵌套性特点表明,国有企业迈向世界一流的不同层面演化具有整体性,国有经济“五力”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 and 整体,“五力”之间协同演化。因此,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不能将“五力”割裂地、独立地进行评价,评价体系也不能每一“力”各自为政地构建,而是要求考虑“五力”共同反映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整体性。这意味着,对于每一“力”的评价体系构建,不仅需要考虑该“力”本身的评价维度和要素,而且应当将其置于“五力”的整体视域予以审视和定位,以筛选、优化和补充评价指标。整体性还要求各“力”的评价指标应当相互协调,既不要各“力”之间出现相互矛盾,又避免不同“力”的评价指标出现交叠,其协调的方向是向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收敛。更进一步,无论是整体的系统评价还是个体的对标引导,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应当在操作层面具有可行性甚至便捷性,因此评价指标体系不宜过于庞大,而是需要筛选出每一“力”的代表性、敏感性指标,能够实质性地反映该“力”的本质内涵与范围。这意味着,指标框架应当与国有经济“五力”具有高相关性,指标分解注重各指标的独立性,具体指标则要求关注各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 2. 评价模型

从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和成长逻辑来看,国有经济“五力”与世界一流企业全球领先的高质量发展画像高度契合,国有经济“五力”评价和衡量本质上是要考察国有经济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程度,即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构建需要围绕“国有经济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目标层)予以开展,并将“五力”作为评价框架的准则层。按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国有经济“五力”的评价重点涵盖功能性评价、结构性评价和运营性评价,并在每一“力”上呈现差异化,结合理论逻辑导向、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和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就可以确定国有经济“五力”评价的通用性、前瞻性和特色性初步指标。依据世界一流企业的共同演化成长逻辑,一方面嵌入“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标准;另一方面将“整体性”“协调性”“代表性”要求作为原则,可以筛选和确定国有经济“五力”评价的最终指标。由此,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模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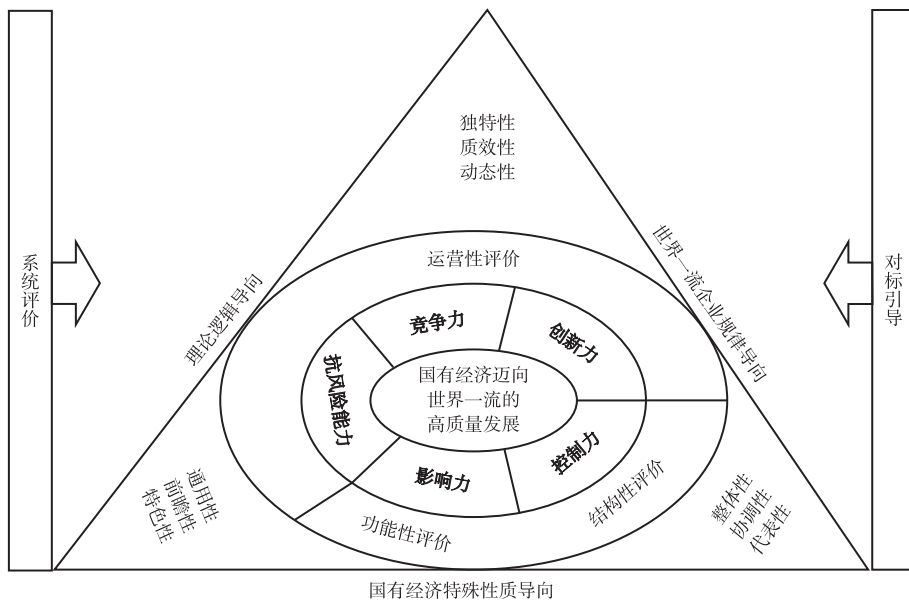


图2 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3. 指标体系

国有经济竞争力在理论逻辑导向上可以由规模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行业竞争力构成,而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则要求突出国有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则强调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更好发挥其核心功能,其中核心竞争力对于不同行业差异较大,可以在行业竞争力中得到反映,以行业核心能力予以衡量,可持续竞争力内嵌和贯穿于规模竞争力、质量竞争力、行业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之中,因此国有经济竞争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就由规模竞争力、质量竞争力、行业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构成。国有经济创新力在理论逻辑导向上可以由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构成,而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则强调国有经济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与效力、创新体系化能力,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则强调国有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其中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与效力可以在创新产出中予以反映,创新体系化能力可以体现于创新过程,因此国有经济创新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国有经济控制力在理论逻辑导向上可以由规模控制力和能力控制力构成,而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要求突出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控制能力,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则强调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及社会公共部门中的主导作用,其中产业链控制能力可以在能力控制力中得到反映,主导作用则通过国有经济在行业和领域的规模控制力与能力控制力予以体现,因此国有经济控制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规模控制力和能力控制力。国有经济影响力在理论逻辑导向上可以由社会发展影响力、经济发展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和品牌影响力构成,而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更强调国有经济的共享价值创造力、品牌影响力、社会认可度,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则要求国有企业全面服务国家战略,其中共享价值创造力可以在社会发展影响力、经济发展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得到体现,社会认可度可以嵌入于品牌影响力中,因此国有经济影响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影响力、经济发展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和品牌影响力。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在理论逻辑导向上可以由风险管理能力、抗经营风险能力和抗财务风险能力构成,而世界一流企业规律导向则更强调国有经济抵御风险的冗余资源、体系化风险管理能力、企业本体健康性,国有经济特殊性质导向则要求国有企业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其中抵御风险的冗余资源可以在抗财务风险能力中得到反映,体系化风险管理能力可以体现于风险管理能力中,企业本体健康性内嵌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之中,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能够抵御风险、保持稳健经营,因此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风险管理能力、抗经营风险能力和抗财务风险能力。

在国有经济“五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基础上,以相近的颗粒度对一级指标进行拆解,拆解过程中,一方面突出世界一流企业对“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的关注;另一方面强调整体性、协调性和代表性的评价要求,同时考虑指标的系统评价功能和对标引导功能,最终形成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17个一级指标和44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在这些指标中,控制力的五个评价指标更偏重结构性评价,影响力的11个评价指标更偏重功能性评价,竞争力的13个评价指标、创新力的九个评价指标、抗风险能力的六个评价指标更偏重运营性评价。竞争力中的行业核心能力、国际竞争力指标,创新力中的创新体系、创新生态、关键核心技术水平指标,控制力中的产业链控制能力指标,影响力中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品牌影响力指标,抗风险能力中的风险管理能力指标,都属于趋势指标;控制力中的规模控制力、定价能力控制力、创新能力控制力指标,影响力中的服务国家战略指标,都属于特色指标;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其他指标,都属于通用指标。

表1 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导向	评价功能		
					系统评价	对标引导	
国有经济 迈向世界 一流的高 质量发展	竞争力	规模竞争力	资产规模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收入规模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员工规模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质量竞争力	净资产收益率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全员劳动效率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行业竞争力	市场地位(市场份额)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财务竞争力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产品竞争力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行业核心能力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国际竞争力	海外投资水平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	
			海外收入水平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	
			国际化广度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国际化模式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创新力	创新投入	创新财务资源投入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创新人力资源投入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创新过程	创新体系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创新生态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创新产出		专利申请量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专利授权量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授权发明专利量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关键核心技术水平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新产品销售收入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控制力	规模控制力	资产控制力	结构性评价/特色指标	√	√	
			资本控制力	结构性评价/特色指标	√	√	
		能力控制力	产业链控制能力	结构性评价/趋势指标		√	
			定价能力控制力	结构性评价/特色指标	√	√	
			创新能力控制力	结构性评价/特色指标	√	√	
	影响力	服务国家 战略	国家战略参与广度	功能性评价/特色指标		√	
			国家战略参与深度	功能性评价/特色指标		√	
		社会发展 影响力	行业就业贡献率	功能性评价/通用指标	√	√	
			行业捐赠贡献率	功能性评价/通用指标	√	√	
		经济发展 影响力	行业收入贡献率	功能性评价/通用指标	√	√	
			行业税收贡献率	功能性评价/通用指标	√	√	
		可持续发展 影响力	行业环保投入贡献率	功能性评价/趋势指标	√	√	
			行业环保投资贡献率	功能性评价/趋势指标	√	√	
		品牌影响力	无形资产价值	功能性评价/趋势指标	√	√	
品牌市场价值			功能性评价/趋势指标	√	√		
社会认同度			功能性评价/趋势指标		√		

续表 1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导向	评价功能	
					系统评价	对标引导
国有经济 迈向世界 一流的高 质量发展	抗风险 能力	风险管理 能力	公司治理水平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
			内部控制质量	运营性评价/趋势指标	√	√
		抗经营风险 能力	抗市场风险能力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抗营运风险能力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抗财务风险 能力	长期偿债能力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短期偿债能力	运营性评价/通用指标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五、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的实证研究

为客观评价中国国有经济“五力”发展现状及变化趋势,本文基于前文提出的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2—2021年中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德尔菲法与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分别计算国有经济“五力”分项指数并合成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结果进行了总体分析,以及分区域、分省份和分行业的比较分析。

#### 1. 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方法与过程

(1)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2021年中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其中,公司治理水平指标数据来源于华证ESG评级数据库,内部控制质量指标数据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其他指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进行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之前,由于存在不同属性和量纲的评价指标,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和式(2)所示:

$$\text{正向指标: } Z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quad (1)$$

$$\text{负向指标: } Z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quad (2)$$

其中, $i$ 代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j$ 代表评价指标, $X_{ij}$ 代表第*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j*项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之前的数值, $\max(X_{ij})$ 和 $\min(X_{ij})$ 分别代表标准化处理之前该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Z_{ij}$ 代表第*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j*项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值。

(2)各级指标权重的确定。自“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展开了广泛的研究(陈景华等,2020)<sup>[45]</sup>,而在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权重赋值方法的选择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德尔菲法和头脑风暴法等主观赋权法虽然发挥了专家的作用,但存在主观性较强而缺乏客观性问题;而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陈景华等,2020)<sup>[45]</sup>;郭芸等,2020<sup>[46]</sup>;吴志军和梁晴,2020<sup>[47]</sup>;李志洋和朱启荣,2022<sup>[48]</sup>)。其中,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能较为客观有效地反映各项指标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来确定客观权重,如果某项评价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则表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体系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反之,如果某项评价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

为了使评价结果客观合理,本文综合运用德尔菲法与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以弥补单独使用主观赋权评价法或客观赋权评价法的不足。首先,选择熵值法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即针对

构成“五力”每个分项指数的所有二级指标,根据每一项二级指标数值之间的变异程度来决定这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大小,由此得出所有二级指标的权重值。然后,再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五力”五个分项指数的权重,共选取了相关研究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开展匿名调查,第一轮开放式地征求各位专家对于分项指数权重的建议,然后汇总整理后反馈给所有专家,同时进行第二轮匿名调查,如此反复直至专家意见基本达成一致。经过四轮匿名调查,最终确定对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五个分项指数均等赋权,即每个分析指数的权重均为0.2,并据此进一步合成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

(3)系统评价的计算过程。首先,计算第*i*家上市公司第*j*项评价指标值的比重,具体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quad (3)$$

其中, $P_{ij}$ 为第*i*家上市公司第*j*项评价指标的比重, $n$ 为样本数。

其次,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熵值,具体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

$$e_j = -\frac{1}{\ln(n)} \sum_{i=1}^n (P_{ij} \times \ln P_{ij}) \quad (4)$$

其中, $e_j$ 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信息熵, $n$ 为样本数。

然后,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信息熵的冗余度,具体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d_j = 1 - e_j \quad (5)$$

其中, $d_j$ 为第*j*项评价指标信息熵的冗余度,信息熵冗余度越大,表示该项评价指标越重要。

最后,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具体计算公式如式(6)所示: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6)$$

其中, $W_j$ 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m$ 为评价指标维度数。

(4)综合指数的合成。首先,计算国有经济“五力”分项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式(7)所示:

$$S_{ih} = \sum_{j=1}^m W_j Z_{ij} \quad (7)$$

其中, $S_{ih}$ 为第*i*家上市公司在国有经济“五力”中第*h*个维度的分项指数评价结果。

其次,计算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式(8)所示:

$$S_i = 0.2 \times \sum_{h=1}^5 S_{ih} \quad (8)$$

其中, $S_i$ 为第*i*家上市公司的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评价结果。

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指标的测量和权重系数如表2所示。

## 2. 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结果总体分析

整体来看,2012—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创新力指数的带动下迈上一个新台阶,表明国有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2012年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为0.071,2015年加速提升至0.077,此后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到2021年达到0.080。目前而言,国有经济“五力”中竞争力指数和创新力指数相对较高,2021年这两个指数均为0.112,明显高于“五力”综合指数;控制力指数和影响力指数相对较低,2021年分别为0.050和0.041,明显低于“五力”综合指数;抗风险能力指数表现居中,2021年分值为0.085,略高于“五力”综合指数。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为

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也为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表2 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指标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度量方法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国有经济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	竞争力 (0.20)	规模竞争力	资产规模, $X_1$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0.018
			收入规模, $X_2$	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	0.015
			员工规模, $X_3$	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	+	0.015
		质量竞争力	净资产收益率, $X_4$	净利润/股东权益	+	0.004
			全员劳动效率, $X_5$	$Ln(\text{营业收入}/\text{员工总数})$	+	0.025
		行业竞争力	财务竞争力, $X_6$	净资产收益率与行业均值的比值	+	0.004
			产品竞争力, $X_7$	市场价值与行业均值的比值	+	0.138
		国际竞争力	海外投资水平, $X_8$	海外关联公司投资额/营业收入	+	0.526
			海外收入水平, $X_9$	海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	+	0.254
		创新力 (0.20)	创新投入	创新财务资源投入, $X_{10}$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
	创新人力资源投入, $X_{11}$			研发人员数量/员工数量	+	0.187
	创新产出		专利申请量, $X_{12}$	专利申请量加1的自然对数	+	0.343
			专利授权量, $X_{13}$	专利授权量加1的自然对数	+	0.325
	控制力 (0.20)	规模控制力	资产控制力, $X_{14}$	总资产行业占比	+	0.242
			资本控制力, $X_{15}$	股东权益行业占比	+	0.210
		能力控制力	定价能力控制力, $X_{16}$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与行业均值的比值	+	0.006
			创新能力控制力, $X_{17}$	专利授权量行业占比	+	0.543
	影响力 (0.20)	社会发展影响力	行业就业贡献率, $X_{18}$	员工数量行业占比	+	0.089
			行业捐赠贡献率, $X_{19}$	对外捐赠行业占比	+	0.154
		经济发展影响力	行业收入贡献率, $X_{20}$	营业收入行业占比	+	0.098
			行业税收贡献率, $X_{21}$	实际纳税行业占比	+	0.026
		可持续发展影响力	行业环保投入贡献率, $X_{22}$	环保投入行业占比	+	0.179
			行业环保投资贡献率, $X_{23}$	环保投资行业占比	+	0.274
	品牌影响力	无形资产价值, $X_{24}$	无形资产净额行业占比	+	0.103	
		品牌市场价值, $X_{25}$	市场价值行业占比	+	0.077	
	抗风险能力 (0.20)	风险管理能力	公司治理水平, $X_{26}$	华证 ESG 评级	+	0.014
			内部控制质量, $X_{27}$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100	+	0.023
		抗经营风险能力	抗市场风险能力, $X_{28}$	营业收入增长率	+	0.067
			抗营运风险能力, $X_{29}$	应收账款周转率	+	0.573
		抗财务风险能力	长期偿债能力, $X_{30}$	资产负债率的倒数	+	0.184
			短期偿债能力, $X_{31}$	流动比率	+	0.139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进一步分析,国有经济“五力”分项指数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创新力指数和竞争力指数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而控制力指数、影响力指数和抗风险能力指数则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竞争力指数是“五力”中分值最高的指数,从2012年的0.097逐年小幅上升,2018年达到最高值0.115,



到2021年仍然保持在0.112;创新力指数是“五力”中增长最快的指数,从2012年的0.053跨越式提升至2015年的0.087,继而持续保持增长达到2021年的0.112;控制力指数是“五力”中最为稳定的指数,从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间始终保持在0.049~0.058之间;影响力是“五力”中分值最低的指数,从2012年的0.047波动上升至2016年的最高值0.052,然后又逐渐下滑到2021年的0.041;抗风险能力是“五力”中下降最多的指数,从2012年的最高值0.101不断下降,到2021年降低至0.085。由此可见,竞争力是保持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石”,创新力是促进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驱动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是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展质量潜力最大的“增长极”,而抗风险能力是阻碍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突出的“短板”。

2012—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与分项指数评价结果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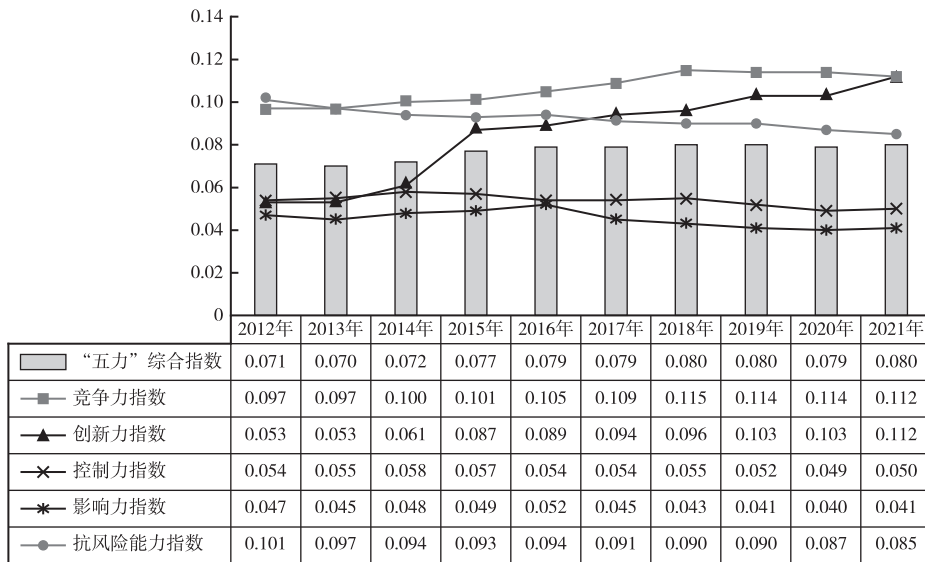


图3 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3. 国有经济“五力”系统评价结果比较分析

分区域来看,2012—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指数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中部地区竞争力指数增长较快,西部地区创新力指数增长显著,表明国有企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明显成效。横向比较看,2021年四大区域“五力”综合指数由高到低分别是:东部地区(0.083)、西部地区(0.077)、中部地区(0.074)和东北地区(0.063)。纵向比较看,2012—2021年四大区域“五力”综合指数均有明显提升,其中西部地区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0.015),东部地区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0.007)。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依然明显,但是区域间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分项比较看,2021年竞争力指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0.121),最低的是东北地区(0.080),十年间四大区域竞争力指数稳中有升,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中部地区(+0.030);创新力指数最高的是西部地区(0.128),最低的是东北地区(0.097),十年间四大区域创新力指数增长趋势明显,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西部地区(+0.079);控制力指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0.055),最低的是东北地区(0.034),十年间四大区域控制力指数基本保持稳定且差距缩小;影响力指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0.045),最低的是东北地区(0.022),十年间四大区域影响力指数呈现较大波动后趋于稳定;抗风险能力指数最高的是西部地区(0.100),最低的是东北地区(0.081),抗风险能力指数是“五力”中区域间差距最小的指数。分省份来看,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指数省际间差距仍然

较大,各省份“五力”综合指数介于0.043~0.116之间,平均值(E)为0.0783,标准差(SD)为0.0191。

分行业来看,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指数行业间差距更为明显,其中,控制力指数和影响力指数两极分化现象尤为突出。其中,“五力”综合指数最高的行业是教育(0.178),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0.161)、采矿业(0.140),最低的是卫生和社会工作(0.033)。进一步分析,竞争力指数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0.195)、采矿业(0.164)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150),竞争力指数最低的是卫生和社会工作(0.020);创新力指数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212)、建筑业(0.199)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0.178),创新力指数最低的是住宿和餐饮业(0.004);控制力指数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0.287)、教育(0.198)以及采矿业(0.173),控制力指数最低的是卫生和社会工作(0.006);影响力指数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0.266)、采矿业(0.147)以及农林牧渔业(0.097),影响力指数最低的是卫生和社会工作(0.013);抗风险能力指数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教育(0.178)、住宿和餐饮业(0.161)以及采矿业(0.140),抗风险能力指数最低的是卫生和社会工作(0.033)。

## 六、结论与启示

###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共同演化理论对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通过历史考察、理论构建和实证评价对国有经济“五力”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1)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缘于历史的淬炼、理性的凝结和经验的升华,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形成的,大致经历了作为起点的“单力”目标时期(1978—1991年)、作为萌芽的“两力”目标时期(1992—1998年)、作为雏形的“三力”目标时期(1999—2011年)、作为发展的“四力”目标时期(2012—2018年)和作为成型的“五力”目标时期(2019年至今)五个阶段。成型的“五力”目标凸显国有经济发展目标的时代性、规律性与趋势性,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新形势的科学把握和提出的新要求。

(2)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和成长逻辑为重新审视、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律与要求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此能够对国有经济“五力”内涵进行更加深刻、系统和一致的理解。国有经济“五力”与世界一流企业标准高度契合,涵盖了显显的结果维度、中间的行为维度和隐性的价值维度,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业绩优异”“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广受认可”特征形成映射。世界一流企业成长逻辑赋予国有经济“五力”更深刻的内涵,需要将“独特性”“高质量(质效性)”“动态性”要求嵌入对国有经济“五力”的理解。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五力”不是相互割裂、彼此孤立的,而是密切配合、相互依存系统和整体,共同反映新时代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五力”形成一个动态系统,“五力”之间呈现相互增强与平衡关系,进而使国有经济动态均衡地演化和处于高质量发展状态。

(3)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体系构建应兼顾两个层面的评价功能即整体的系统评价与个体的对标引导,区分三大构面的评价重点即功能性评价、结构性评价和运营性评价,基于三重导向的评价指标即通用指标、趋势指标和特色指标,符合三个方面的评价要求即整体性、协调性和代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模型,形成由国有经济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作为目标层,由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构成准则层,由17个一级指标、44个二级指标构成指标层的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指标体系。

(4)以中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系统评价发现,2012—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

综合指数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分项指数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创新力指数和竞争力指数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而控制力指数、影响力指数和抗风险能力指数则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近十年来,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中部地区竞争力指数增长较快,西部地区创新力指数增长显著。2021年国有经济“五力”综合指数省际间差距仍然较大,行业间差距更为明显。

## 2. 政策启示

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结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经济“五力”提供了方向引导和政策启示。

(1)坚持将提升国有经济“五力”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五力”是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反映,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具体体现。然而,从评价结果来看,近些年“五力”集合反映的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较为稳定但却遭遇“瓶颈”,如何突破“瓶颈”进而使国有经济“五力”持续提升成为未来推动国有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这意味着新时代新征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继续围绕增强国有经济“五力”这一基本目标,将持续提升国有经济“五力”、迈向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的努力方向。无论是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还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无论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还是优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都应当以增强国有经济“五力”为导向,将相应的要求落实于各项改革行动。

(2)更加强调国有经济“五力”提升的协同性和每一“力”的“质量”。从评价结果来看,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发展水平明显弱于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并在近年的变化上呈现方向上的差异,表明国有经济“五力”之间的协同性仍需增强。更进一步,国有经济“五力”是一个密切配合、相互依存系统和整体,每一“力”都与其他四“力”协同进化,呈现出相互增强与平衡关系,因此未来提升国有经济“五力”应当更加突出各“力”之间的协同性,而不是过于强调某一“力”或某几“力”而忽略其他之“力”。与此同时,面向世界一流提升国有经济“五力”需要更加突出每一“力”的质量水平,强调每一“力”的本质卓越,而不是将以量为核心的程度作为根本。提高每一“力”的“质量”要求深入其最本质、最核心和最持久的元素,将构建和优化这些元素置于提升国有经济“五力”更加突出的位置。

(3)持续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提升国有经济“五力”的重要导向与抓手。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先进生产力和生产组织的代表,国有经济“五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特征画像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在微观层面上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将是国有经济“五力”提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全面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打造和扩大国有企业的世界一流企业群体,对于显著增强国有经济“五力”至关重要。为此,一方面,需要按照分类分步推进的思路,针对与世界一流企业差距程度不同的国有企业分别实施差异化策略,对接近型、较近型、较远型和远距型四类国有企业分步骤推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王欣,2023)<sup>[32]</sup>,形成国有企业在世界一流企业坐标上的梯队布局;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实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专项行动,深化和扩大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创建行动,评估、巩固、优化和创新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加快实施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和中央企业品牌提升行动,构思、策划和新增其他更多必要的补短板专项行动。

(4)全面夯实新时代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制度基础与能力基础。国有经济具有深度的制度嵌入性,国有经济“五力”提升高度依赖于宏观与微观的制度安排。从宏观制度来看,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共同做强做优做大,为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提供根本制度保障。与此同时,要构建更加合意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让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成为提升国有

经济“五力”的制度助力。从微观制度来看,要按照世界一流企业“治理现代”的要求,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更加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形成更加适合、更加匹配、更加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为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提供组织制度基础。除了制度安排,提升国有经济“五力”还应当全面增强国有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能力,重点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弘扬和铸就一流企业家精神,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步伐。

(5)深入实施针对国有经济每一“力”的适配性与差异化提升策略。国有经济每一“力”具有个性化特征和具体的影响因素(李政,2022)<sup>[5]</sup>,表现出迥异的运行规律,因此提升国有经济“五力”除了依据共性因素夯实共同的制度基础与能力基础外,还应当考虑每一“力”的独特性采取匹配性的差异化提升策略。对于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重点是要通过全方位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全面塑造和增强国有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全球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对于提升国有经济创新力,重点是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创新产出等全方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打造高水平的原创技术和新兴技术策源地,形成全球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与效力、创新体系化能力。对于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重点是要继续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加强调国有经济在“质”方面的控制能力,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增强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控制能力,形成世界一流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控制力、关键能力控制力、趋势把控力。对于提升国有经济影响力,重点是要深入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重大可持续发展议题,开展卓著品牌创建行动,持续提升国有经济的共享价值创造力、品牌影响力、社会认可度。对于提升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重点是要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建设,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增强企业本体健康性,打造韧性组织,形成国有经济发展的本质安全和抗冲击能力。

#### 参考文献

- [1]欧阳耀福,李鹏.论国有经济创新力的核心地位[J].成都:经济学家,2021,(3):24-34.
- [2]李正图,米晋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国有经济“五力”[J].上海经济研究,2022,(10):5-12.
- [3]王欣.“五力”确保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N].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10.
- [4]张园,吴鸾鸾,李浩澜.国有经济“五力”指数构建与评价: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21.
- [5]李政.新时代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径[J].上海经济研究,2022,(1):5-11,26.
- [6]张继良.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J].北京:经济学动态,1999,(5):11-18.
- [7]宋冬林,于群.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经济控制力[J].北京:管理世界,2003,(8):142-143.
- [8]周新城,王世崇.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研究[J].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4):52-55.
- [9]陈炳芳,卢华.如何把握国有经济的控制力[J].北京:宏观经济管理,1998,(9):32-33,38.
- [10]张国.中国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J].北京:国有经济评论,2012,(2):12-21.
- [11]周学文.如何认识并测算“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控制力”?[J].北京:中国统计,1999,(8):19-21.
- [12]谢敏.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0.
- [13]李钢,何然.国有经济的行业分布与控制力提升:由工业数据测度[J].重庆:改革,2014,(1):124-137.
- [14]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量化分析[J].北京:统计研究,2001,(1):3-10.
- [15]盛毅.用行业集中度确定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数量界限[J].成都:经济体制改革,2010,(6):15-20.
- [16]徐传谩,齐树天.国有经济控制力及控制方式新探[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2,(6):37-43.
- [17]欧阳强.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路径选择[J].昆明:经济问题探索,2005,(1):12-14.
- [18]王子林.混合所有制改革视阈下的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7,(5):30-36.
- [19]李政,周希祺.新时代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理论内涵、现实意义、独特优势与实现路径[J].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5):102-109.

- [20]滕越,伍凌智,王勇.国有经济创新力提升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J].成都:经济体制改革,2022,(2):26-33.
- [21]周立群.论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J].天津社会科学,1998,(4):31-37.
- [22]丁志铭,丁晓钦.国有经济主导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J].成都:经济体制改革,2004,(2):84-88.
- [23]刘震伟,张正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指标构架研究——以上海国有经济为例[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6):5-13.
- [24]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9-41.
- [25]胡叶琳,黄速建.再论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J].北京:经济管理,2022,(12):28-45.
- [26]黄群慧.“新国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40年回顾[J].北京:China Economist,2018,(1):58-83.
- [27]刘瑞明,亢延银.企业的力量:“大分流”视野下的世界一流企业构建[J].西安:人文杂志,2018,(3):23-32.
- [28]崔新健,欧阳慧敏.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展、差距和策略[J].北京:经济学动态,2020,(5):28-40.
- [29]肖红军.面向“十四五”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成都:经济体制改革,2020,(5):22-29.
- [30]曾宪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问题研究[J].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20,(1):81-88.
- [31]黄群慧,余菁,王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国际经验与中国情境[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7,(11):5-25.
- [32]王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J].重庆:改革,2023,(2):28-46.
- [33]Penrose, E.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M].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34]Lewin, A. Y., and H. W. Volberda. Prolegomena on Co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Strategy and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9, 10, (5): 519-528.
- [35]Volberda, H. W., and A. Y. Lewin. Co-evolutionary Dynamics within and between Firms: From Evolution to Co-evolu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 (8): 2111-2136.
- [36]Hodgson, G. 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12: 259-281.
- [37]黄凯南.共同演化理论研究评述[J].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7-101.
- [38]Lewin, A. Y., C. P. Long, and T. N. Carroll. The Co-evolution of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9, 10, (5): 535-550.
- [39]Wernerfelt, B.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 (2): 171-180.
- [40]Barney, J. The Resource-Based Theori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 (6): 643-650.
- [41]Teece, D. J., G. Pisano, and A.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7): 509-533.
- [42]Helfat, C. E., S. Finkelstein, W. Mitchell, M. A. Peteraf, H. Singh, D. J. Teece, and S. G. Winter. Dynamic Capabilities: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 [43]Teece, D. J.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 (13): 1319-1350.
- [44]Porter, T. B. Coevolution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06, 19(4): 479-504.
- [45]陈景华,陈姚,陈敏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12):108-126.
- [46]郭芸,范柏乃,龙剑.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10):118-132.
- [47]吴志军,梁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比较与战略路径[J].南昌:当代财经,2020,(4):17-26.
- [48]李志洋,朱启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武汉:统计与决策,2022,(6):95-99.

# Assessment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Under the Growth Logic of the World-Class Enterprises: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evolution Theory

WANG Xi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conomy to strengthen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stage evolution of “single capacity – two capacities – three capacities – four capacities – five capacities”. Based on the co-evolution theory and the growth logic of the world-class enterprise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nd considers that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dimensions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The growth logic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endows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with more profound connotation. The evolution law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can deeply penetrat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ssessment model for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orld-class orientation, and forms an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orld-class orienta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 world-clas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conomy as the target layer, competitiveness, innovation capacity, controlling force, influencing power and risk resistance capacity as the criterion layer, and 17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44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s the indicator layer. Taking China’s A-share state-owned holding listed companies as a samp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nd constructs composite index and sub-indexes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mposite index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showed a steady growth trend, and the sub-indexes showed an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trend. Furthermore,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the indexes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is gradually narrowing, but the inter-provincial gap and the inter-industrial gap between the indexes is still significant.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ak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s the basic goal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synergetic promotion of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nd the “quality” of each “capacity”, sustain to taking the building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orientation and keynote to enhance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comprehensively consolidate the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capacity founda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nd deeply implement the adaptative and differentiated promotion strategy for each “capacity” of state-owned econom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establish a link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logic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and the “five capacities”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the second is to construct the assessment model and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five capacitie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orld-class orientation, the third is to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five capacities”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based on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state-owned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 world-class enterprise; five capacit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P21, P31, F23

**DOI:** 10.19616/j.cnki.bmj.2024.03.005

(责任编辑: 闫梅)